

思 虑 与 欣 慰

——记黄钰生先生为之呼吁的图书馆界协作事竟成

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黄钰生看了最近发出的关于《坚持改革,加强协作,发展和建设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报告后,无限感慨地说:“这下有希望了”!接着,他针对报告指出的:“全国图书馆事业缺乏统筹安排和全面规划,既未建立起文献资源的保障体系,又存在着文献缺漏和不合理的重复现象,不能做到资源共享”,“加强各系统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与协作是我国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对图书馆提出的要求”,“成立全国图书馆情报工作部际协调委员会,由国家科委牵头为主任委员,文化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工委为副主任委员,各地参考上述做法自行决定”云云,联系前几年访问美国时考察的情况,他说:不管图书馆有多大,包打天下的是没有的,不依靠别人不行。当时,我们参观了美国的两所大学图书馆和三个公共图书馆,令人惊讶并十分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与州立公共图书馆和市民的关系很好,很密切。大学图书馆参加州图书馆的网络,互通有无;大学图书馆对公共图书馆及公众开放,居民可以到大学借书。华盛顿州图书馆网络控制64个图书馆,可以做到:(1)资源共享——一个图书馆虽然只有十万册书,但它可以使用整个州内各个图书馆的成百万、上千万册书;(2)检索方便——我们检索图书通常只有书名、著者和分类三个渠道,而人家还包括图书的主题与时代等等;我们只能在一个关键词上找到书,而人家可以在许多关键词中找到书。这些图书馆都很讲究,自动化水平相当高。

随后,他沉浸于长期为之呼吁并付出不少辛劳的关于协作协调的往事的回忆中,他说:1956年,我曾提出搞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的建议,在市委支持下,天津搞了起来,起过积极作用。1957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原天津市人委批准成立了天津市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从1957至1966年间,该委员会在图书采购、馆际互借与编制联合目录等方面为生产科研服务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可惜十年动乱中都被否定了。此后,在“图书馆恢复开馆”期间,黄老对恢复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更为热心。许多年来,在人代会上或在市政协召开的会议上,他总善于把握时机,结合五、六十年代组织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经验,有理有据郑重地提出提案,建议恢复加强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工作。1982年10月,黄钰生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次科学讨论会上接受《光明日报》和本刊记者采访时即指出:“各自为政、单位所有,垄断图书资源,是当前我国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联合起来,迅速恢复和建立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又说: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并不是新东西。早在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我国已建立了第一、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和一些地区中心,可惜这个好做法至今尚未恢复健全。继而指出,现在办图书馆常有“大而全”,“小而全”的思想。其实是“全”不了的。目前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都在采取联合、协作、协调的办法以节约开支,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效益。黄钰生指出,成立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目前的好处首先是方便科技人员,次而节约开支。从长远说,将为图书馆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新技术准备条件。1985年5月在中宣部,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上,黄钰生先生作为曾出席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1956年)的图书馆界老前辈又相机慷慨陈词,说:“采

改革小议

刘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现状与发展”中提出：十年来图书馆学理论界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目前理论界似乎正处在某种沉思阶段，一方面，人们意识到理论建设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容易，理论热情明显降下来；另一方面，理论界平静的表层下正在积聚能量，喷薄待发，人们期望，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从此走上更加健康的轨道。

重思学科建设的势头，是个好势头。在冷静的思索中，首先使人顿悟到科学研究的严肃性，有人把这十年的发展深刻地归纳为十年观念史；观念中的首要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价值观问题。过去几年对理论的极端漠视或急功近利的思想，即是人们思想逆反的结果，而且与理论价值观问题有直接联系，若不树立正确的理论价值观，必然有越来越多的人鄙视理论，理论研究的面貌也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

近来人们多谈降低理论研究层次、加强应用研究、中介化、操作化等发展方向，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大势所趋。但有人据此认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不必要了，我认为呼吁降低理论研究层次、加强应用研究与加速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理论丝毫不相矛盾，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没有理论，就根本无所谓降低和应用，目前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尚处在胚胎期，正需从哲学方法论、从实践等各个方面汲取营养，促其形成发育，而不能扼杀它。提出降低研究层次和应用研究主要是为了强调实践，反过来促进理论的发展，同时端正理论研究的价值观；不要喜好标新立异，不要过多地进行“太超前于时代”的研究，应注意同实际结合等等，而决不是要求放弃理论，那样的话，应用研究也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购外文书刊进行分工，协调在当前书价上涨的形势下尤为必要。列宁很重视图书馆工作，很早就提出关于图书馆协作和建立图书馆网络的论述，反对平行发展。五十年代周总理和聂总重视了这个问题，制定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解决了不少问题，文革以后一直未恢复起来，这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三年过去了，八旬高龄老人执着以求的

实现图书情报界协作协调事业的心愿终于“有望了”，成立全国图书情报工作部际协调委员会并要求各地参考执行，以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工作的文件终于下达了，解决图书馆界长期存在“老大难”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石头落地”的哪般心绪，确难以言喻。

(文 佳)